

历史文化卷

華夏文明在甘肅

主 编 ◎ 刘 基
副主编 ◎ 刘再聪

(上)

史文化卷

華夏文淵在甘肅

連石署



(上)

主編◎劉基
副主編◎劉再聰

编 委 会

学术顾问 李学勤 樊锦诗 晁福林 赵逵夫 王巍 叶舒宪

主 任 连 辑

副 主 任 刘 基 刘仲奎

委 员 (按姓氏拼音排序)

把多勋 曹 进 陈 青 邓小娟 杜睿哲

伏俊琰 韩高年 胡小鹏 李并成 李玉璧

李兴江 刘再聪 田 澍 王 鉴 王玉芳

王宗礼 徐兆寿 雍际春 张 兵 张德芳

张君仁 张文礼

序

甘肃位于祖国版图的几何中心,区位优势明显。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深厚的文化底蕴,多样的民族融合与伟大的社会实践,孕育了甘肃特有的精神气质,创造了发达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成为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传承和弘扬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国家战略安全、建设国家安全生态屏障、促进民族团结发展和甘肃转型崛起,乃是当前时代的需求。

甘肃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资源宝库,是华夏文明重要发祥地,是“彰显华夏文明的重要历史文化基地”。早在 20 万年前,甘肃境内就有人类生息。七八千年前,甘肃先民创造了灿烂的大地湾文化。大地湾文化是传说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开创辉煌时代的真实展现,是甘肃远古时期文明的代表。周王朝的先祖从陇东高原崛起,以农为本,以德治国,奠定了中华民族的礼仪与道德传统。秦王朝的先祖从陇南山地崛起,称霸西戎,依法立国,铸造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

从汉朝开始,甘肃地区整体正式融入中国大历史之中。随着西汉张骞“凿空”,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由东向西横贯甘肃全境,甘肃成为中西陆路交通的孔道和门户,成为中原王朝经略西域的前沿阵地。十六国时期,在整个北方“胡风”劲吹的大趋势下,凉州成为汉文化的三个中心之一,而五凉文化则成为隋唐盛世文化制度的源头之一。隋唐时期,甘肃进入辉煌时期,民族和睦,社会繁荣,经济鼎盛,史载“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胡商贩客,往返如织,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空前兴盛。中西方文明

在纵横千余里的甘肃大地交流碰撞,开创了华夏文明的新篇章。

宋代以来,由于历史、自然、地理等客观因素,甘肃的历史辉煌渐趋消退,经济发展逐渐落伍。近代以来,与东南地区相比,甘肃尤显贫瘠、闭塞、落后。目前,甘肃还处在资源丰富而经济后进、文化厚重但有待开发的境地。寻找突破口,追求大发展,成为两千多万陇人的现实追求。事实表明,甘肃是文物的集中点、华夏文明的闪光点。与发达省份拼经济、拼人才、拼科技,暂时没有太多的出路,可以拼的就是资源、特色,还有文化。因此,发展文化产业是实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支撑点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要求更加紧迫。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支持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家发改委《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中共甘肃省委关于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加快文化大省建设的意见》等为甘肃开展华夏文明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策基础,为甘肃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了全面的战略部署。在这一大背景下,甘肃打造“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推动文化大省建设这一重大战略应运而生。

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对全国具有典型性和示范性,对甘肃具有牵动性和长远性。据闻“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将围绕“一带”,建设“三基地”,打造“十三板块”,简称“1313工程”。“一带”,就是丝绸之路文化发展带;“三基地”,就是以伏羲文化为核心的陇东南文化历史基地、以敦煌文化为核心的河西走廊文化生态基地、以黄河文化为核心的兰州都市圈文化产业基地;“十三板块”,就是文物保护、大遗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古籍整理出版、红色文化弘扬、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试点、文化与生态旅游深度融合、

文化产业发展、文化品牌打造、文化人才培养、节庆赛事会展等。相信通过传承创新区建设,加快发展甘肃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探索经济欠发达但文化资源富集地区实现转型跨越发展的新路子,将为同类地区与全国同步进入小康社会提供示范。

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提高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支撑。甘肃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是一项宏伟的系统工程,前景广阔,“华夏文明资源”的价值提升和内涵挖掘将成为重要的突破口。发掘历史文化资源,当着眼于根本——传承保护,立足于开拓——创新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开发新价值,发挥新能力。

由西北师范大学主持编纂的《华夏文明在甘肃》这部书,在华夏文明大背景下全面展示甘肃历史文化资源的宝贵价值,对甘肃历史文化做了全新定位,内容充实,学风朴实,且可读性强。书中梳理了甘肃系列特色文化:远古神话与伏羲文化、大地湾文化、彩陶文化、早期周文化、早期秦文化、简牍文化、石窟文化、长城文化、五凉文化、西夏文化、敦煌文化、民族文化、丝路文化、黄河文化等,规划了一批重大文化产业项目:报刊发行、广播影视、演艺娱乐、出版印刷、戏剧动漫、节庆赛事、特色文化产业园区和文化企业等,构思了全新的发展思路:增强文化自我发展能力,提升文化竞争力,提高文化传播力,扩大文化影响力,推动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打好文化资源富集牌,推进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等。这些论述和分析,有助于以更大的力度全面提升甘肃文化的凝聚力、影响力和竞争力,切实做好文化资源的传承保护和创新发展,使华夏文明博大精深的内涵更加丰富璀璨。

是为序。

李博勤

2013年4月9日

于北京清华园

前 言

甘肃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资源宝库,拥有十分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其种类之繁多,内容之丰富,特色之鲜明,在全国具有独特的地位。据最新调查资料显示,甘肃共有远古时代以来的遗址遗迹 17000 余处,其中世界文化遗产 2 处(敦煌莫高窟、嘉峪关万里长城)、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72 处、省级重点文保单位 625 处(馆藏一级文物 1750 多件),在全国居于前列。同时,还有多处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风景名胜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文化名镇等。同时,甘肃有非物质文化遗产 27000 余种,其中世界级 2 项(甘南藏戏、洮岷花儿),国家级 61 项,省级 270 项。另外,甘肃有 266 部古籍入选《国家珍稀古籍名录》。这些文化遗产是华夏文明起源和繁荣发展的见证和标志。

“华夏”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孔颖达疏曰:“夏,大也。故大国曰夏,华夏谓中国也。”^①华夏最初指我国中原地区,后来包括我国所有地区。“文明”一词最早出现在《周易》和《尚书》中,有光明和显耀之意。清初李渔《闲情偶寄》中有“辟草昧而致文明”的说法。这里的“文明”与“草昧”对称,有社会进步之意。18 世纪以来,西方一些国家常以“文明社会”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落后的生产方式及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野蛮”状态相对。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把人类历史分为蒙昧、野蛮、文明三个发展时代。以此看来,华夏文明是指中国摆脱“蒙昧”、“野蛮”状态开始进入新的更发达社会的时代,其表现形式包括这一时代

^① 《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85 页。

所创造的所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关于文明开始的标志,国内外学者提出了许多看法,其中以“三要素”类最具代表性。1968年,英国学者丹尼尔《最初的文明·关于文明起源的考古学研究》提出了“文字、城市、复杂的礼仪中心”三要素,且认为一个社会只要具备其中两项,即可判定为文明。1977年,日本学者贝冢茂树《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提出了“青铜器、文字、宫殿基址”三要素。^①1985年,夏鼐提出了“青铜器、文字、城堡”三要素。^②1986年,苏秉琦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三要素。后两种说法在我国学术界影响很大。

一、甘肃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1. 安特生和鸟居龙藏关于甘肃文化的认识

关于华夏文明起源问题的讨论是从华夏民族的起源开始的。18世纪后半叶,欧洲的一些汉学家认为华夏文明是外来文明。如:法国人德经认为中国人来自埃及,波提埃和卢内尔曼认为中国文明与巴比伦文明有关。1885年,英国人拉古别里主张黄帝是从巴比伦迁来的。此外还有中国民族来自印度、缅甸、中亚、西亚、土耳其、蒙古等说法。这些说法中的华夏文明即“华夏民族”。1921年以来,瑞典人安特生先在河南,后在甘肃、青海等地发现了彩陶,认为甘肃彩陶文化是中国彩陶文化发展的最高峰。但安特生同时认为,甘肃彩陶与中亚、东欧史前彩陶相类似,并受其影响。安特生的说法为中国文明“西来说”提供了考古学上的证据,从而使世界学术界对中国文明“外来说”的认同程度达到了极致。

随后,山东章丘龙山文化遗址(1931)和河南安阳殷墟(1933)出土的大量史前时代遗物从根本上动摇了华夏民族“西来说”,华夏民族“本地说”被提了出来。本地说有多种提法,包括新疆说(德人李希霍芬)、甘肃

①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页。

② 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说(日人鸟居龙藏)、“南方说”(卫聚贤)、“北方说”等。日人鸟居龙藏认为,“甘肃古有一族,尊上帝而敬祖宗,即为汉人之祖,后乃向东迁移同化原住民族。”^①这种说法很大程度上出于假设和文献上的大胆推测,缺乏具有说服力的证据。安特生和鸟居龙藏的认识虽然很快就被否定,但甘肃丰富的远古文明则是不容置疑的。

2. 大地湾文化是华夏文明多个起源中心之一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地区考古发展迅速。不断增多的出土文物显示,中国考古文化不止一个系统,而且各系统独立发展,又相互影响。从此,人们对“华夏文明”的大系统有了新的认识。1979年,夏鼐将中国新石器文化划分为七大区域:黄河流域之外还有长江流域的马家浜文化、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辽河流域的凌源牛河梁红山文化,华南的石峡文化,甘肃的秦安大地湾文化等,开考古学认识上的中国文明起源“多元说”之先河。^②接着,“中华民族多元起源论”学说、^③“多元一体格局”学说相继问世,^④华夏文明有多个文明起源中心逐渐被认同。甘肃秦安大地湾文化被认为是华夏文明起源的中心之一。大地湾文化遗址展示的是从一般聚落向中心聚落的演进过程,是我国目前考古发掘同时代遗址中的唯一发现,可以认为是华夏先民从乡村走向城镇发展变迁的最早见证,是阶级萌芽的表现,被誉为“城乡革命的前奏曲”。^⑤

3. 高度发达的甘肃先秦文明

彩陶文化、伏羲文化是高度发达的甘肃先秦文化的代表。以马家窑文化为代表的甘肃彩陶代表了中国彩陶工艺的巅峰水平,其时代要早于仰韶文化。其中大地湾一期开始出现的彩陶与西亚两河流域彩陶同为世界上最早、同时创造的两种彩陶文化,为探索中国彩陶的起源提供了新的线索。甘肃彩陶文化持续发展了近5000年,出土器物数量多,分布区域

① 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56页。

② 夏鼐:《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考古》1977年第4期。

③ 苏秉琦:《中华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④ 严文明:《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中原文物》1996年第1期。

⑤ 郎树德:《大地湾考古与中国文明起源的线索》,《西北史地》1983年第3期。

广，纹饰繁复，艺术成就和学术价值极高，堪称全国之冠。

伏羲，自古相传为三皇之首，班固将其列为第一等上上圣人 13 位之首，居炎帝神农、黄帝轩辕之前。伏羲氏“继天而王”，是“百王之先”。^①汉晋以来，伏羲氏“生于仇夷”、“生于成纪”的说法屡见于文献。仇夷和成纪居渭河上游、西汉水上游一带，即今甘肃天水市周围地区。因此，天水是伏羲氏发祥的中心区。1516 年，明朝在水天正式设立太昊伏羲氏庙，经过多次扩建和修缮，现已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伏羲庙，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地湾遗址长达 3000 年的文化积淀为伏羲诞生于甘肃之说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证据。

周秦王朝是中华礼制文明完善时期和中华帝国体制成熟时期，但先周和先秦文明分别发端于甘肃的陇东和陇南。夏朝末年，周人先祖不窋率领族人来到陇东，势力逐渐壮大。周族的核心主体形成于甘肃东部，为周人的统一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陇东出土了父乙铜爵、父丁铜觚、父辛铜斚等大量商代青铜器，是探索陇东古方国与商王朝的关系和交流的重要线索。灵台白草坡、宁县宇村等地西周墓葬、车马坑等遗址出土了虘伯铜方鼎、黑伯铜提梁卣、穆公铜簋盖等珍贵青铜器物，是研究周代的礼制及科技水平的重要依据。秦人在天水、陇南繁衍生息，积聚力量，创造了辉煌的秦文明，成为华夏文明的源头之一。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西垂陵园、圆顶山先秦贵族墓葬遗址出土了刻有“秦公作”铭文的青铜鼎、簋、壶、编钟及金虎、玉器等珍贵文物，时代属于西周晚期到春秋战国时期，器型高大，工艺水平可与中原青铜器相媲美。大量珍贵的青铜器物的出土，极大地推进了对周人和秦人的崛起、秦人统一中国的历史条件及其与西方交流的认识。

另外，甘肃是中国旧石器的最早发现地，也是中国已知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和青铜器发现地。甘肃先秦文明发达，甘肃考古发现影响深远，正如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所说：“中国历史文化早期的一系列核心疑问

^① 《汉书》卷 20《古今人表》，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863 页。

和谜团,恐怕都不得不求解于甘肃。”^①

二、甘肃历史文化资源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华夏文明是动态的,是不断发展着的人类文明形态之一。秦汉以来,甘肃的广大地区逐渐成为华夏文明区的中心地带,丝绸之路文化、多元民族文化和陇原红色文化成为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了华夏文明的内涵。

1. 丝绸之路文化

19世纪80年代,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中国》一书提出“丝绸之路”概念。^②甘肃地区是丝绸之路最重要的主干区段。丝绸之路东西贯穿甘肃全境,长达1600多公里,众多的历史文化遗址繁星般的布满漫长的丝绸之路沿线。甘肃丝绸之路文化以长城文化、简牍文化、敦煌文化、石窟文化、五凉文化等为代表。

长城带是农耕民族与游牧部族的交界地区,双方在这里既有冲突,又有融合,最后实现了交融与认同,进一步丰富了华夏文明。^③战国时期,秦昭襄王在陇西一带设置郡县,并修造了甘肃境内最早的长城。秦始皇建立起统一的封建王朝后,修建了西起甘肃临洮东至大海的万里长城。^④汉武帝跨越黄河、开拓河西走廊,修建了以甘肃敦煌为起点的汉长城。明朝建立后,甘肃嘉峪关成为明长城的最西防线。至此,中国历史上四大朝代修筑的长城的西端点都在甘肃境内。目前在甘肃省境内,走向明确、遗

① 李学勤:《仰望星空——甘肃考古文化丛书·总序》,《仰望星空——甘肃考古文化丛书》,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② China: the Results of My Travel and the Studies Based Thereon. 书五卷,另有地图集,1907—1912年出齐。

③ 李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移民运动与中华文明的整体升华》,《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1期。

④ 《史记》卷88《蒙恬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66页。

迹清晰的战国秦长城、秦始皇长城、汉明长城及各地散段长城长达近5000公里,经过50多个县、区,城障烽燧遗址近600座。其中,甘肃河西走廊是国内唯一汉、明长城并存的地区,山丹县新河驿附近的长城是迄今国内保存最完整的夯筑长城,甘肃山丹汉明长城被誉为“长城露天博物馆”。像这样不同历史年代修筑而同时并行,并至今留存较为完整的长城段在国内绝无仅有,甘肃因此有“长城之省”的美称。

汉晋简牍是汉武帝以来中原王朝开拓甘肃河西走廊、经营西域的重要历史见证,是西汉后期至西晋近300年间河西地区社会发展全貌的最原始记录。截至目前,甘肃出土简牍近7万枚,接近全国出土简牍的半数,其中汉简占全国出土汉简总数的80%以上。简牍出土地点从甘肃天水一直延伸至甘肃敦煌,贯穿全境。甘肃简牍的问世,奠定了中国简牍学研究的雄厚基础,给中国历史学研究带来新气象。整个20世纪前半期,国内出土的简牍都在西北地区,其中甘肃占绝大多数。可以说,中国早期的简牍研究史就是甘肃简牍研究史。罗振玉编印的中国第一部简牍学专著《流沙坠简》就是对甘肃简牍的整理和收录,而居延汉简的发现与研究更是掀起了中国简牍学研究的新热潮。甘肃素有“简牍之乡”的称誉,今天依然是国际简牍文化的研究中心之一。

1900年发现的敦煌藏经洞文书达5万多件,被誉为“古代学术的海洋”。由于历史的原因,敦煌遗书散居世界各地,直接催生了国际显学——敦煌学。从中西交流的角度而言,敦煌是世界古代四大文化交融的中心。季羨林曾经讲道:“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①甘肃是敦煌学的故里,是世界敦煌学研究的中心。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敦煌文化已经成为全世界人民共同的财富。

佛教石窟艺术起源于印度,经中亚传入中国西北。新疆的佛教石窟

^① 季羨林:《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红旗》1986年第3期。

艺术保留有浓郁的犍陀罗风格,而甘肃佛教石窟艺术中中国的传统文化因素陡然增多。甘肃境内石窟的数量、造像艺术内涵之丰富堪称中国第一。中国五大石窟中,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就在甘肃,而甘肃“凉州石窟”则是中国最早见于史册记载的石窟。北魏占领河西后,凉州高僧昙曜将河西石窟的艺术风格付诸云冈石窟,而云冈石窟又直接影响了龙门石窟。因此,甘肃河西的“凉州石窟”被誉为中原石窟的最早范式,甚至有“凉州模式”之称。^①另外,中原的佛经传播、禅法戒律的流行都与甘肃河西有关。可以说,甘肃河西地区是中国本土佛学的早期摇篮。甘肃境内石窟多达百余座,石窟艺术享誉世界,甘肃有“中国石窟艺术之乡”的美誉。

五凉文化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甘肃河西地区为中心。在战争频仍、中原动荡的时代,甘肃河西走廊地区保持了相对安定的社会局面。《晋书·张轨传》记载,当时中原士人有“天下方乱,避难之国唯凉土耳”的感慨。不仅大批中原名望大族和博学士人避难西北,而且“太常乐工多避地河西”。^②他们与当地名流结合、交融,共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五凉文化。五凉文化在保存中国文化典籍,继承儒学传统,促进关中文化的复兴进步、江南王朝文化事业发展、北魏文化建设和汉化改革、中外及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等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在隋唐大一统局面形成过程中,五凉文化成为盛世文化制度的来源之一。^③

2. 多元民族文化

甘肃地区古史的中心内容就是民族关系,^④甘肃的历史可以说是中国西部民族历史的缩影。氐、羌、戎、月氏、乌孙、吐谷浑、突厥、回鹘、吐蕃、党项、蒙古等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在这里密切接触,甘肃及周边地区成为中华民族融合发展的重要场所。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甘肃逐渐形

① 宿白:《凉州石窟遗迹和“凉州模式”》,《考古学报》1986年第4期。

② 《资治通鉴》卷137齐武帝永明九年(491年)十二月条胡注,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4315页。

③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页。

④ 金宝祥:《甘肃地区古史的中心内容是民族关系》,《文史知识》1997年第6期。

成了丰富多彩民族民俗文化。其中伊斯兰教文化、藏传佛教文化、特有民族文化以及以花儿、道情为代表的民俗文化最为典型。

传入中国后的伊斯兰教,既保持信仰文化的内核,又借鉴吸收儒道成分,逐渐融入中国文化大局,并成为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门宦是伊斯兰教苏菲主义传播到中国后,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甘肃临夏是中国伊斯兰教门宦的发源地,当前仍为中国门宦最为集中的地区。中阿合璧的圆拱形或八角形建筑形式的“拱北”是中国伊斯兰教先贤陵墓的称谓,甘肃一带特色鲜明的门宦及其亦儒亦伊的拱北成为伊斯兰教文化中独特而不朽的象征,其中甘肃临夏砖雕已经成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藏传佛教,又称为喇嘛教,是7世纪佛教显、密宗两佛教系传入西藏后与西藏本地宗教“本教”结合的产物,在甘肃主要传播于甘南藏族自治州及天祝、肃北、肃南等自治县内。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的拉卜楞寺是我国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是甘肃境内藏传佛教文化的代表。目前,拉卜楞寺保留有全国最完整的藏传佛教教学体系。

在今天祖国的民族大家庭中,东乡族、裕固族和保安族为甘肃特有。裕固族主要分布在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东乡族和保安族则居住在临夏州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三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服饰、音乐舞蹈、姓名、婚俗、饮食、民歌、语言文学、节日、信仰禁忌等民族文化,特色鲜明。其中裕固婚姻习俗文化、东乡饮食文化、保安腰刀文化可为代表。

甘肃“花儿”是一种多民族共同创造、共同享用、具有强烈的表演艺术特征的民歌,可分为河州花儿、洮岷花儿,传唱在甘肃临洮、康乐、和政、广和、永靖、夏河、临潭、岷县、卓尼一带。20世纪20年代,甘肃花儿就引起了民俗学家的关注。^①“花儿”内容丰富多彩、形式自由活泼、语言生动形象、曲调高亢优美,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乡土特色,深受回、汉、藏、东

^① 袁复礼:《甘肃的歌谣——“花儿”》,《歌谣周刊》第八十二号,1925年3月15日。这是“花儿”在全国文学中首次出现。

乡、土、撒拉等民族的喜爱。除了在农事劳动场合歌唱外,各地还有举办“花儿会”的习俗,其中规模比较大者有“康乐县莲花山花儿会”、“岷县二郎山花儿会”、“和政县松鸣岩花儿会”等。

道情本是以道家故事为题材,在道观庙宇进行演唱的说唱艺术。传统道情多为一人说唱,众人帮唱,说唱相间,以唱为主。后来道情逐渐走向民间,成为反映民间故事的民俗演唱形式。甘肃道情主要传唱于陇东地区,被称为陇东道情。其中道情皮影最具特色。道情皮影的独特之处在于用皮影的形式演唱道情剧目,形成了表现形式与表现内容相统一、有形有声、可视可听的完整演唱艺术。陇东道情后来发展演化为陇剧,演出剧目以历史剧《枫洛池》为代表。

3. 陇原红色文化

1905年同盟会成立及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在省外学习的甘肃青年就积极投身其中,由爱国进而倾向革命,成为甘肃最早的革命者。他们回到甘肃后,点燃了陇原红色文化的火种。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甘肃保留了全国唯一的革命根据地。第三次革命战争时期,这里又成为走向全国胜利的出发点。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甘肃大地留下了许多革命遗址和革命文物,铸造了辉煌灿烂的陇原红色文化。

早期革命斗争文化:1911年的辛亥革命,在甘肃得到了广泛响应,陇东、陇南、河西等地都有起义发生。1912年3月11日爆发的“秦州起义”推翻了清朝在天水的统治,是全国辛亥革命运动中的最后一次起义。1921年以来,革命斗争愈演愈烈,甘肃各地也爆发了多次革命暴动,主要有两当兵变(1932)、靖远兵暴与水泉堡起义(1932)、西华池兵变(1932)、兰州水北门兵变(1933)。其中靖远兵暴与水泉堡起义规模最大,起义队伍打出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西北抗日义勇军”的旗帜,影响很大。

长征文化:在红军长征所经过的十多个省中,就时间之长、活动之频繁、影响面之广以及其特殊地位来说,甘肃省有显著的特点和特别的意义。甘肃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前经过和战斗过的最后一个省份,是参加长征的红二十五军及红一、二、四方面军等主力红军都经过的唯一一省

份,也是红军长征活动时间最长的省份之一。红军长征历时整整两年,从红二十五军 1935 年 8 月进入甘肃算起,则近有一年半时间。另外,西路军在河西走廊浴血奋战至 1937 年 4 月;甘肃是红军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之一,红军长征经过了今甘肃 14 个地州市 80 多个县中的 12 个地州市的 50 多个县。甘肃是红军长征途中召开“转折性”会议和进行“决定性”战役最多的省份之一,如俄界会议、腊子口战役、哈达铺会议、榜罗会议、打拉池会师、会宁会师、山城堡战役。其中,1936 年 10 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是长征胜利的标志,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转折点。毛泽东曾断言:“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红军长征在甘肃期间进行的重大活动、战斗及会议,蕴涵着非常丰富的军事文化,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拼搏、奋发向上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是华夏文明新的组成部分,并成为此后一直激励和鼓舞人们英勇无畏的力量源泉。

根据地文化:1934 年,刘志丹、习仲勋等开辟了以甘肃华亭县南梁乡为中心的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创建了中国西北第一个工农民主政权——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后与谢子长等领导创建的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西北革命根据地。陕甘革命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我党硕果仅存的一块革命根据地,为长征中的党中央和各路红军提供了落脚点,为八路军北上抗日提供了出发点。中国革命的斗争从这里走向全国,直到取得全国的胜利。

三、学术研究是科学认识甘肃历史 文化资源丰富内涵的基础工程

甘肃历史文化资源的学术价值很高,其中敦煌遗书和汉晋简牍是中国近代学术考古四大发现之二种,直接催生了敦煌学和简牍学两门世界显学,这在全国实属仅有。从历史文化资源的分布区域、出土数量及保存质量来看,甘肃当属中国的文物大省之一。甘肃历史文化资源具有源头性、多样性、独特性和包容性等特色。在重视华夏文明的大背景下,开展

特色文化专题研究,是科学、合理认识甘肃历史文化资源丰富内涵的必由之路。

华夏文明研究是目前学术研究的热点,也是难点,无论是起源的标志还是内涵的组成,都存在着很多争议。今天我们要彰显甘肃华夏文明特色,核心的问题在于是否尊重学术规范,站在学术的高度来理性地认识甘肃华夏文明的特点与地位,避免从地方的视角自言自语进而无限放大区域文化的价值。只有按照学术规范的要求,将甘肃历史文化放在华夏文明整体研究的框架中,合理挖掘甘肃华夏文明的价值与作用,才能客观地认识甘肃华夏文明的内涵与特点,才能赢得学界乃至全社会的尊重和认同。

目前,对甘肃华夏文明的学术研究仍处于零星的个体的研究状态,有计划、有步骤的团队研究远未形成。这是甘肃“文化大省”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亦是甘肃文化发展研究院和甘肃华夏文明传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工作的重心和当务之需。没有较高的学术研究水平,不可能合理挖掘甘肃历史文化的内涵,更不可能有效地开发利用历史文化资源。甘肃要建设“文化大省”,学术研究必须走在前列。在甘肃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研究与利用中,敦煌文化的研究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当今,只要提起甘肃,人们马上就会想到敦煌。可见,学术研究与区域文化关系之紧密。但其他文化类型则大多待字闺中,缺乏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成果,影响力相对有限。就我们的理解而言,至少在以下关键问题上应展开系统的有深度的研究,才能较好地回答人们的疑问:

1.甘肃黄河文化:尽管人们对华夏文明的起源有诸多说法,但黄河流域作为发祥地之一是毋庸置疑的。在黄河文明研究中,如何认识甘肃黄河文化的内涵,甘肃黄河文化与其他黄河流域省区文化的联系与区别等问题,需要通过多次学术会议研讨才能达成一定的共识。在具体研究中除了甘肃学者外,还必须吸引国海内外的研究者共同参与。

2.甘肃华夏文明的源头文化:甘肃有众多的华夏文明源头文化类型,但系统研究不够,缺乏集大成、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以至于外界对甘肃产生误解和偏见,视甘肃文化为偏域文化。只有在甘肃华夏文明的源头文